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我想去看泸定桥

■ 颜崇道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想去泸定桥的想法已经在心中压抑很久了,最近越发控制不住。

50年前,我在村小读四年级,课本中有《飞夺泸定桥》一文。那天中午,太阳炙烤、教室里炎热,蝉声令人困倦。老师在讲台上念到22名勇士爬上铁索桥时,我突然清醒,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:13根铁链子挂在高空的河上,对面还在打枪,人往前爬。那时我只有十来岁,在村头的小河沟里摸鱼,河宽不过几步,都觉得水深。大渡河有多宽,水有多急?人怎么过去呢?

这个问题当时没有问出口,但一直没有放下。

难忘老家那道岭

■ 顾建德

一道缓棱棱的山梁,横在资中县双河镇街道背后,像劳累后侧卧休息的石匠,当年,全村6个生产队顺着岭势铺开。长山岭人的根,就扎在这道岭上。

岭顶地势开阔,当年的大队部和村小都设在这里,我们生产队大部分土地也在这里。岭脊上一条断断续续的青石板路,南北几里长,说不清是哪年哪月,村里的石匠和乡亲用石板一块一块铺出来一条路,串起各生产队的沟沟坎坎,是全村人赶场、走亲戚、挑粮卖货的路。

长山岭不高,也不奇,土薄石头多,长不出好林子,连坡上的草也被割得光秃秃的,只间杂几丛刺梨,扎在石缝里。可长山岭人祖祖辈辈就靠它讨生活:早年间,坡上种茶叶,沟里种谷子,麦子玉米在土坡上轮种,一茬接一茬,都是靠天吃饭的营生;后来,开山打条石、打白石,匠人的锤声响遍了整道岭。村里传了几代的石匠手艺,都是从这岭上的石头里磨出来的。

天不亮,石板路上便有了窸窣动静。挑菜的二婶肩上扁担晃得叮呀响,裤脚沾着岭边的露水珠;背竹蔑的老汉佝偻着腰,竹蔑片擦着路边的黄荆丛沙沙响。走在最前头的多是石匠,短褂挽到胳膊肘,锤把子上缠了又缠的黑胶布,解放鞋鞋壳上糊着一层白石粉;领头的老石匠话不多,歇气时把烟锅子往鞋底磕两下,又低头赶路。收工迟了,一行人摸黑往回走,铰子别在腰后,撞着帆布腰带叮当作响。

1976年,我初中毕业,失学回乡当石匠,天天顺着这条岭上工,正午太阳毒,就蹲在石厂那块“拐拐石”歇脚,捧着岩缝里浸出来的山泉水喝一口,凉气从喉咙浸到心窝,浑身的疲惫消散了大半。

挨着大队部的院墙有棵黄葛树,两三个人抱不拢,树下搭着半间土坯房,是张婆婆的老茶店,旁边还有我三叔开的代销店,这一角是全村最热闹的去处。我放学路过,常替家里买盐、打油,父亲要抽的烟,多是先赊着,三叔在账本上记一笔,有钱再给。赶场天走累了的人都往茶店里钻,5分钱一碗盖碗茶,抓一把炒瓜子,就能坐半晌午。

石匠们最爱凑在屋檐脚,摆哪家修房子要的条石多,哪家要娶新媳妇,龙门阵伴着笑声,混着茶叶的香。夏天,岭脊的风口凉,收工的人都挤在黄葛树下,脱了草帽扇风,汗水裹着芭茅的青气,吹得树叶哗哗响。张婆婆也不催客,靠在门框上纳鞋底,听大家摆龙门阵,摆到太阳偏西,才慢悠悠地收碗。

半坡那大片草坡,是我们小时候放牛的去处。把牛绳往荆条上一拴,一群娃儿便漫坡疯跑:上树摸雀蛋,下坡摘地瓜,又扒开芭茅丛找野果。牛在坡上吃草,我们在石窝里玩泥巴,玩到太阳落坡,才慌慌张张牵牛回家,免不了挨母亲一顿骂。冬闲时节,草坡上面就成了集体石场,生产队组织人打条石修水渠、砌堰塘,锤声响彻整条岭,铰子敲得火星四溅。

后来村里通了两条公路,顺着山势蜿蜒,汽车能直接开到每个生产队。石板路慢慢荒了,芭茅长到了路中间,三叔的代销店早已撤销,开茶店的张婆婆已经去世,土坯墙变成了小砖房,那棵黄葛树还守在风口上。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,早些年岭上土坡撂荒了不少,近些年封山育林复了绿,硬化路通到了垭坝边。新公路边已修好了歇脚亭,赶场的人走累了,亭子里已有些坐处。

据说岭上要整田土,撂荒地改成顺坡梯田,连片栽上药材、观赏花木。镇里、村里请来专家在岭头转,指指画画,规划以后要怎样。老一辈人还时不时去转一转,看看老石场的旧整痕,望望新整的田土,摸摸当年亲手下栽的血橙树、梨儿树。

逢年过节,上了年纪的人回村,总爱顺着老石板路走一段。风从岭脊吹过来,还带着芭茅的干气息,像还捎着些当年的声响,细听,又没有了。那道岭就一直横在那里,声不响。石匠的汗渍浸进石缝,割草娃的脚印留在山坡上,几代人的日子都藏在这石缝土坡里。



朱实临风生

张雨义 摄

秋风吹过柿子树

■ 米丽宏

暮秋的一个下午,我跟朋友们在山野里闲逛。山路两边的沟沟岔岔里,立着很多柿子树。

那些柿子树,像醉酒的老汉——穿着他的红布衫,挂着他的红灯笼,笑眯眯地沉默在川上。

老树沉默,却也放旷。一树的虬枝丫杈漫空疯跑,跑得停不下来,似在无声喊着口令:向前,向前,向前。那枝子杈子无法无天,四面出击,一团张狂。

它们就那么红艳艳、沉默而张狂地站在秋风里。走向这样的老树,不管你有多沧桑,在它面前,你都是稚嫩的。走近,就像孩童敛着身子扑进了一片灯笼的红光。

那跳跃的红,红得清爽又萧瑟。谁能辨出,霜降后的柿子树,几分是热情,几分是清涼。辨不出。那就让它静静地燃烧、微凉地燃烧,让干枯的骨头再烧几丛美丽的火吧。

岁月慢下来。这暮秋难得的绚烂,恒久站定,似乎永不挪窝。

秋风四起,北风也会肆虐起来,围剿似的,欲扑灭秋天经营的一切。想那盏盏“红灯笼”被风扑击,在枝头扑闪出一道道模糊的红影子。左右摇着,上下晃着,颠簸着,折腾着……

谁的心都会一上一下跳动,为柿子担心、惊惧吧。可是,来日入冬,你去瞭望枝头——红灯笼多半还悬在那里,似乎挺安然的样子。安然的背后,藏着几多疼痛与惴惴?

看看地上,你一定猜得出,总有一些挨不住的倒霉蛋,在风中落地,零落成一摊红泥。红泥迸裂,像火焰喷射,惨烈又悲壮。

柿子却也不是任人拿捏的。在枝头,它圆润完美地燃烧;落地,就碎裂如浆地燃烧,烧成一片液汁四溅的火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软柿子,有一种硬骨气。大风吹过柿子树,它始终不改红彤彤的坚守;霜降凛冽,它去掉戾气与青涩,内心愈加甜润。

曾经也涩过、狂过,硬扎扎地峥嵘过;一场场降霜后,皮变薄,肉变

软,味道更美。它在枝头时很绚丽,但其实它很平凡,平凡到村人很少费劲儿去采摘;你觉得它寻常时,它又拥有你意想不到的面。当光阴流过,它们转化着、成熟着、甜美着。有春风吹拂,不浪费春风;有白霜降临,不回避白霜。寂寞的时刻,享受寂寞;来了大风,就抛开一切犹疑,浩歌曼舞,享受激情的大风。

从山野回来,红彤形的柿子影像一直在脑海里闪回,夜深了,我还在怀想那一棵棵老柿树。我在纸上涂涂抹抹,轻轻写下我的记忆。我坐得太久,腰已僵硬,腿已酸麻,两脚几乎在地下生出了根。朦胧中,我的两臂也散枝开叶、开了碧玉般的花。哦,亲爱的,我是时光中的一棵树吗?一棵经久耐老的柿子树。

十载,二十载,我默默守着时光过活。如今,窗外寒霜,已覆满大地,心里的霜攒了一季又一季。我的枝头挂满了晶莹红柿,每一颗,都是被风霜摩挲过的心。

想想也是有趣。白萝卜和胡萝卜被摆在同一个摊位上,挨得那么近,甚至被同一只手翻来拣去,可它们其实谁也不认识谁。它们只是名字里恰好都带个“萝卜”,就像两个都叫“张伟”的人,名字一样,翻开身份证一看,祖籍一个天南一个地北,八竿子打不着。

“萝卜”这个叫法,是人类图方便给的俗名。植物学却不认这套。植物学看的是花、是果、是种子、是茎叶的构造。白萝卜开十字形的小花,四片花瓣排成十字;胡萝卜开伞形的小花,一簇一簇犹如撑开的小伞。花不一样,根不一样,长的叶子也不一样。

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这件事。名字是名字,本质是本质。我们经常把很多东西混为一谈,只因为它们看起来像,叫起来顺口,就以为它们是一回事,其实差得远呢。

白萝卜和胡萝卜各属各科,在植物界里有各自的位置。事实往往比我们以为的更清楚,也更简单。

晚上做饭,我把白萝卜切块炖了汤,把胡萝卜切丝炒了肉。它们在锅里各自散发各自的味道,谁也不干扰谁。儿子凑过来闻了闻,说:“爸爸,它们虽然不是一家的,但在一起还挺香。”我点点头,发现这话比植物学更有意思。

那顿饭吃完,儿子教给我的东西,像两根萝卜一样,留在了我心里。白萝卜和胡萝卜只是被人随手搁在一处,不争吵,也不攀亲,各自安安静静地做自己。至于我们,看见类似的东西,别急着归成一样;听见同名,别急着当成同类。白萝卜不认识胡萝卜,这没什么不好。世界本来就是这样,各是各的,各好各的。能认出事物彼此的不同,才算真正看见了它们。

在阳台上看月亮

■ 王继琼

阳台上摆着一张塑料凳,红漆已经掉了一层。它是我在教师宿舍的第一件家当,坐上去有点晃,一晃就“吱”一声。凳子旁边立着拖把,晾衣杆上挂着毛巾,风一吹,巾角就扫在我耳朵上。凳脚边擦着一叠作业本,我每天晚上都坐在这儿等月亮。

这话说出来文艺得不像实话。我教了20年书,白天上课、批改作业,在办公室里接家长的电话,晚上搬个塑料凳坐在阳台上看月亮,自己也觉得有点假。可我确实是这么坐着的。

刚搬来的时候,月亮不好找。对面有栋楼,比我们这栋高许多,月亮爬上来,先被高楼的楼边挡住,要等它走到楼角的位置,才忽然一下,整张脸露出来,刚好位于两栋楼顶之间。我后来记住了它的位置:空调外机上面一点,再往左一尺。到了时间,我就抬头看。

城里的月亮薄。它不亮,像被人擦过一道,边上还发毛。它悬在天上,底下是别人家的窗户,有的亮着灯,有的已经暗了。有些晚上,云从它后面走过去,月亮被挑一下,露出来,再被挑一下,又躲进去。看得多了,我就不着急。

一年四季的月亮不一样。春天雾重,月亮常常是白蒙蒙的一块。楼下枇杷树的叶子湿漉漉地反着光,能听见水从叶尖上往下滴,“喀”“喀”。这时候我坐不久,湿气太重,嗓子眼一到阴天就发痒,忍不住要咳两声。夏天看月亮最好是雷雨过后。雨一停,云往下沉,月亮就露出来。雨后的月亮最清,清得发凉,光落在阳台的水泥地上,把我拖地留下的水印照了出来,一道道斜铺着。蚊子多,我点一盘蚊香放在脚边,烟是直的,升到及腰高才散。秋天看月亮最舒服。天空干净,风也干,月亮比平时大一圈,边缘利落。楼下有人在跳广场舞,音乐一阵一阵送上来,很少。月亮不理它们,照旧挂着。冬天冷。我穿棉袄坐一会儿就得进屋。有一年腊月十五,月亮亮得能把晾衣杆的影子照在地上,我看了很久,进屋的时候鼻子冻得发酸,用手一摸,是湿的。

月亮这东西,我从小看到大。在老家,月亮在院坝上空。吃过晚饭,父亲坐在门槛上休息,母亲在灶房里洗碗,我躺在凉席上,数月亮旁边的云。我妈从灶房出来过一趟,说,不要用手指月亮,指了要烂耳朵。我赶紧把手收回来,攥在胸口,攥了很久。

小时候的月亮又圆又满,一抬头就在,我从来没有专门去看过它。后来离开家乡,月亮就不好看了。刚分到乡下学校教书的头一年,我住在学校后面一间旧教室改的宿舍,瓦顶,西晒,白天晒得像锅盖,晚上烫得睡不着。几个年轻老师把席子铺到操场上,躺成一排。月亮从山背后升上来,比城里的月亮大,红得像蛋黄,走到一半,被篮球架上的横杆切成了两半。有个同事说:“你们看,上头半块是月亮,下面半块也是月亮。”大家都笑。笑完,谁也没说话。

再往后,我换过两所学校,看过几种月亮。宿舍的窗户对着一堵墙,墙外头有月亮,看不见;带学生出去比赛,住在县城的宾馆里,窗外的月亮亮得能看清停车场的车牌;坐夜班车赶回来监考,月亮跟着车往后退,退了一路。

前年有一回,我妈晚上给我打电话,问我冷不冷,我说不冷。她说话的时候背后有风声,我问她在哪儿,她说在院坝上收豆子,“月亮大得很,看得见豆子。”我当时也站在阳台上,抬头看我们这边两块楼顶之间的天——我这边是阴天,楼缝里一片黑。

我大概就是从母亲收豆子这个晚上起,才认真在阳台上看月亮的。其实我并不是在看月亮。它不会变,一晚上只挪一格。是我自己在变。坐着的时候,才觉得这一天的活干完了:作业本批到了最后一摞,明天要讲的课已经备完,家长群里没有人再追问分数,母亲的降压药还有半盒,儿子下个月的生活费转过去了……这些东西压着我,只有坐在阳台上这一会儿,它们才松开一点。

今天晚上的月亮不错。我坐在这把摇晃的塑料凳上,安静地看着。楼下有人骑电动车过去,两盏灯一前一后;有一家的小孩在哭,哭声从四楼传下来,传了一段停了。月亮走到楼角的位置了,正好落在前后两栋楼的楼顶中间。

我站起来,把凳子往墙边推。明天早上头一节有课,得早点睡。明天晚上它还会从楼角出来,先被前楼挡住,再挪到楼顶之间,一下整张脸露出来。

进屋关灯之前,我回头看了一眼,月亮还在。

白萝卜不认识胡萝卜

■ 瞿杨生

周末,我带儿子去逛菜市场。白萝卜和胡萝卜挨着摆在同一个摊位上,一边白白胖胖的,一边橙红细长的,宛若被安排坐在一起的陌生队伍。儿子蹲下来,左手摸摸白萝卜,右手摸摸胡萝卜,忽然抬头问我:“爸爸,它俩有什么区别?”我随口答:“颜色不一样呗,一个白,一个橙。”儿子摇摇头,一脸认真地说:“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科。”

我愣住了。一个10岁的孩子,站在菜摊前,用“科”这个概念纠正了我。我蹲下来,和儿子平视,听他一板一眼地讲:胡萝卜是伞形科的,跟芹菜、香菜、茴香是亲戚;白萝卜是十字花科的,跟大白菜、芥菜、青菜是一家。他说得眉飞色舞,我听得心里发虚。这些年天天买菜做饭,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也不知儿子从哪本书上看来的,记得这样清楚。